

汉盐渑县建县研究及县治位置分析

史为征,刘薛艳,孙梦媚

(盐城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江苏 盐城 224001)

摘要:汉代盐渑建县的研究成果丰富,前人研究已基本可以证实汉盐渑县应建立在盐城东沙冈之上。此前,关于盐渑县的建县时间多立足于对历史文献进行梳理,并结合考古资料进行佐证,以分析盐渑建县是因其独特的经济地位、地理位置。经对盐城最新考古资料分析,结合文献梳理,从盐渑建县目的确认汉代盐渑县的建县时间及县治位置。初步认为,盐城置县是在汉代初期巩固统治、中期“除国置县”巩固中央权力、“开三边”加深边疆治理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结果,是汉代对东南沿海开发的重要节点,而汉代盐渑县治的位置应在麻瓦遗址,也就是今沙井头遗址一带。

关键词:盐城;盐渑;汉代;建县;县治;位置分析

中图分类号:K24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25)01-0001-06

关于盐渑建县的研究成果颇丰,姜立邦^[1]阐述了“盐渑”名字的起源,凌申^[2]论证了盐城因盐置县的过程,认为盐渑建县应建在东沙冈上,周运中^[3]则阐释了盐城县东西大海、小海的关联,基本可以证明汉盐渑县应建立在东沙冈之上。在盐渑置县的位置研究方面,南京博物院^[4]推测麻瓦遗址就是汉代“盐渑”县城所在地,吴桂兵^[5]则分析了高等级墓葬和盐渑区位之间的关系。本文根据最新考古资料,结合文献梳理,探索盐渑建县目的,确认汉代盐渑县建县时间及县治位置。

一、盐渑建县时间

陈昌文^[6]认为,汉代城市数量由少变多,增置城市的原因逐渐从重视政治军事功能变为经济功能。文献记载“临淮郡,武帝元狩六年置。莽日淮平……县二十九:……盐渑有铁官……。”^[7]1589-1590“广陵郡,景帝置为江都,武帝更名。建武中省泗水国,以其县属……盐渑故属临淮……。”^[8]3461由此可知西汉武帝元狩六年时已设置盐渑县。学界通常认为盐渑县设置的时间为“元狩四年(前119),分射阳县东部建立盐渑县(一说元狩四年前置),地属广陵郡。”^[9]56光绪《盐

城县志》参考《食货志》记载:“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使属在县”,^[10]28各类传记在元狩四年后无置铁官之事,以此论证盐渑建县在元狩四年。

据《史记》和《汉书》记载,公元前201年(汉高祖六年),刘邦封刘贾为荆王,“王淮东五十三城”。周振鹤按《汉书·地理志》记载的西汉末年淮河以东各郡辖县的数量,排除公元前201年以后新设的县级政区,基本确定封给荆国刘贾的53个城已经包括盐渑县区域,以此认为盐渑建县为汉高祖六年(前201)。^[11]

本文拟梳理盐渑地区位置和属地变迁论证盐渑建县时间。王红花通过论述“祝其亭”,认为祝其属于东海郡,亭是秦汉之间的一种基层机构,“十里一亭”。^[12]《水经注》卷二十六《郡国志》曰:“自东海分属琅琊。阚骃曰:‘即祝鲁之音,盖字承读变矣’。沐水又南径东海厚丘县,王莽更之曰祝其亭也。”官印被称“玺”应在秦以前,至王莽时期官印仍被称为“印”,该封泥应是战国时期,说明战国时期的麻瓦遗址已经有了官署机构。

周振鹤认为盐渑区域在西汉初年属于荆国东阳郡。^[13]144惠帝七年,刘濞吴国之吴、鄣、东阳三郡辖域范围与高帝十年刘贾之荆国相同。景帝三

收稿日期:2024-11-22

作者简介:史为征(1978—),男,江苏徐州人,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地方史、海盐文化、考古与文物保护。

年(前 154 年),爆发吴楚七国之乱,同年反叛被平息,吴国被废除,景帝徙汝南王刘非为江都王,仅管辖东阳一郡(辖域范围与文帝十一年东阳郡相同)。吴国故地范围内有王国一:江都国(东阳郡)。汉郡二:会稽郡、鄣郡。汉武帝元狩二年(前 121)江都王刘建谋反被杀,江都国被废除,改为广陵郡。元狩六年(前 117),分沛郡、广陵郡两郡之地置临淮郡。^{[14]202}

战国时诸国边境多置亭,以守望防敌,而战国该区域正位于齐楚交界处,对考古出土的文物进行辨别,麻瓦遗址为楚文化区域。《左传·定公十年》:“夏,公会齐侯于祝其,实夹谷”。根据前后文可知祝其属于齐莱夷之地,且为边地。《汉书·地理志》记载,祝其属东海郡,并注引《禹贡》“羽山在南,鲧所殛。莽日犹亭”。羽山即今山东郯城县东北,祝其即今天的江苏赣榆县西北约五十里,^[12]与当时盐渎区域相邻。

通过对盐渎区域行政隶属梳理,我们可知战国时期麻瓦遗址覆盖区域和祝其亭有着一定的行政关系,因此该区域应该是一处与亭相关的行政机构。进一步推测麻瓦遗址是与祝其亭平级的亭,因此二者之间有行政交往(是否涉及外交因不在本文论述范围之内故不作讨论)。

麻瓦遗址在秦初为东海郡属地,秦末为东阳郡,汉属荆国、吴国(东阳郡)、江都国(东阳郡)、广陵郡、临淮郡。汉高祖五年(公元前 202)封刘禅为射阳侯,公元前 192 年(汉惠帝三年)项伯去世,子项猷有罪,不得代,侯爵国除。当时侯国属郡,不隶属封国,后期武帝实行“推恩令”置“王子侯国”,侯国依然属郡不再隶属封国,^[5]中央权力加强,封国实力减弱。

汉初废除侯国多改为乡聚,并不置县。置县则归郡(中央)管理与封国制矛盾。至景帝中六年,江都国境内仍有三个侯国。射阳侯国已被废除,并不会设射阳县。故盐渎设县并非由古射阳县分置而立,根据前文梳理应是在设广陵郡以后方可设置射阳县、盐渎县,二者并置。由此可见盐渎县的设置应不早于元狩二年(前 121 年),且不晚于元狩六年(前 117 年)。根据前文“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使属在县”,各类传记在元狩四年后无置铁官之事,据此论证盐渎建县在元狩四年,比较可信。部分学者认为“封给荆国 53 城”含有盐渎区域,以此认为公元前 201 年盐渎建县,这是对郡国制和郡县制的混同。

二、盐渎建县原因

根据马孟龙^{[15]41}的研究,虽然武帝以后旧县的稳定性依然很强,但增置新县的幅度却大大提高,至汉末新置县邑在各郡均占有相当比重。即便旧县的延续性很强,但随着新县增置的大幅度提高,县级政区的稳定性也有所下降。汉代新增县级区划的主要来源为除侯国和“开边新县”。

笔者根据吴楚七国之乱分析,汉景帝在“七国之乱”后对这一地区的政区格局做了较大的调整:吴王濞、楚王戊、赵王遂的封域都被大幅削夺。吴王濞共领三郡,此次被削的封地为鄣、会稽二郡。二郡均为吴国经济较核心之地区。鄣郡铜山为“即山铸钱”之山,会稽郡则包含了“煮海水为盐”之海岸线大半。《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载:“孝景四年,吴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为贞信,乃劳苦之日:‘南方卑湿’徙衡山王王济北,所以褒之。”^[16]这些记载表明景帝四年时,江淮之间被认为是适宜居住的地区,因此设置江都国(东阳郡),也说明此时汉代政府没有关注此区域。而此时,中央对郡县的设置,经济因素已逐渐成为趋势。陈昌文认为,汉代城市发展的显著标志是:城市数量增多,规模扩大,经济职能增强。^[17]这说明在海边设置郡县主要原因是经济因素。安徽寿县曾出土带“盐金”字样的楚国金币,说明此时盐的经济价值十分凸显。“盐渎”的盐指海盐,“渎”古为通海的大河,“盐渎”名字本身就说明了设县的经济意义。因此,因盐业经济而设置“盐渎”是十分可靠的。

七国之乱,历时三个月平定,汉景帝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进一步缩小封国的版图。楚国、淮南国、吴国等封国的很多边郡被收归中央,当地诸侯的实力大幅削弱,同时将封国皆置于江北,隔绝它们与越人的地域关联。但这也意味着,过去封国所承担的边防重任转移到了江南诸边郡的身上,且这些边郡还扮演着制衡江北诸侯的角色。内制诸侯而外攘蛮夷的双重责任,必然对边郡的实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汉书·昭帝纪》曰:“武帝始开三边,徙民屯田,皆与犁牛。”对东越、南越的开发是武帝时的既定政策。元狩元年(公元前 122 年)淮南王作乱需要“东收江都、会稽,南通劲越”,才能“延岁月之寿”,^{[17]3092}这说明此时的封国虽不具备和中央对抗的实力,但还可以依靠东部资源和南越地

理与中央对抗。《汉书·卷五十三景十三王传第二十三》记载:“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立为汝南王,二十七年薨,子建嗣。”刘非的继承人刘建,“遣人通越繇王闽侯,遗以锦帛奇珍,繇王闽侯亦遣建荃、葛、珠玕、犀甲、翠羽、蜃熊奇兽,数通使往来。”可见汉代的江淮地区,沟通南越已经成为平常之事。这说明中央和东部封国的矛盾已转化为对东部资源的占领和对南越的治理。汉中央急需开拓东部地区,控制南方的边疆。

因此“盐渑县”建立,是平定“七国之乱”“淮南王作乱”,为“开三边”“平定南越”做准备。再加上该区域从战国到武帝经过多年的经营,经济地位进一步提升,最终因盐设县。

三、盐渑建县位置

万历县志《建置志》云:“先世欲建城射阳,以射阳土不及海边厚,且海可渔、滩可樵,为民生之利,于是乃城海上”。光绪县志卷一《輿地志上·城池》另有记载:“汉盐渑故城在今县西北”。^[18]³⁶盐城建县主要是以地理形势为据,因此“今之县城近附范公堤,堤在唐曰常丰堰,在宋曰捍海堰,未筑堰时,其地为海水漫溢所及,必不可建城”。《民国续修盐城县志稿》则进一步认为,当时盐城县西部的楼王庄(今盐都区楼王镇一带)可能即汉盐渑县治所在,此地名为大城头、小城头及曾发现土城围墙;建湖县收成庄昔名首城,因在古射阳湖东岸,也有学者推论有可能是汉盐渑治所。

结合文献记载及学者推论,基本有三处盐渑县治所在:一是亭湖麻瓦遗址,二是建湖收成庄;三是楼王庄。而通过20世纪60年代起的考古调查工作,学者普遍认同亭湖麻瓦遗址为盐渑县治所在,笔者也赞同这个观点。

1. 楼王庄调查

2020年起盐城考古工作者先后多次对盐都区楼王及周边进行调查,并在2021年对楼王镇沿宝河南侧、楼大线西侧地块进行了调查勘探,均未发现汉代遗址。楼王镇位于大纵湖(古射阳湖)东北岸,距离西冈尚有一段距离,此地河网密布,从地理位置及成陆情况来看,在汉代不适宜设置县城。南京博物院推测县治“在今县西北”的记载错误,实为“在今县东北”即麻瓦遗址,^[4]这个推论相对符合实际。

2. 收成庄调查

2023年在紫金文创研究院前期研究和组织

下,南京大学联合盐城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组织考古工作队,对九龙口附近的古射阳湖东岸地区文化遗存开展考古调查勘探工作。

收成遗址,位于收成村中部,平面呈不规则形状,南北约90—185米,东西约155米,总面积约29000平方米。依据本次考古调查勘探的成果获知,遗址的第①层为近现代扰土或填土,第②层为明清文化堆积层,第③层为唐宋文化堆积层,第④层为自然生土层。收成遗址出土了唐代黑釉碗、青瓷碗等各个时期遗物,故收成庄遗址主要为一处唐宋遗址,年代暂无法上溯到汉代。而在古射阳湖东部的另外两处遗址,新阳遗址和沙庄遗址则出土了较多汉代文物遗存,有陶钵,陶罐等。同时,还出土了汉代板瓦、筒瓦、瓦当等构件。汉代瓦的使用有严格的规定,筒瓦使用等级较高,说明了此处可能存在高等级官式建筑,而板瓦则主要用于普通民居建筑,说明此处存在居住人口,由此可以进一步推测九龙口区域在汉代存在具有行政等级的城镇。

西晋人杜预在《春秋左传集解》中记载,邗沟“东北通射阳湖”;北魏酈道元《水经·淮水注》:“昔吴将伐齐,北霸中国,自广陵城东南筑邗沟,城下掘深沟,谓之韩江,亦曰韩渎沟,自江东北通射阳湖,地理志所谓筑水也,西北至末口入淮。”南京大学学者对古射阳湖西岸的调查,发现古射阳城南北长约800米,东西宽约700米;古城有内外两道护城河,内护城河围着的是城市中心区,外护城河围着的是主城区。调查显示,收成庄唐以后遗址较为丰富,虽然附近沙庄、新阳遗址两处发现汉代遗址,但规模较小。与南京大学学者对射阳湖西岸古射阳县调查出土文物比较,可知该处遗址应为古射阳的辐射区域。通过调查对比及时间线梳理,可以看出古盐城区域和古射阳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

麻瓦遗址曾发现“射阳丞印”封泥,“射阳丞印”是射阳建县后使用,这也是古盐渑和古射阳关系的一种体现。通过上述论述,可推测当时两者应该是并列关系,因相邻而产生行政交往。

3. 麻瓦遗址调查

1957年,在盐城北门外东北部沙井一带,发掘出大面积汉代遗址,后命名为麻瓦遗址。1962年南京博物院组织人员对射阳湖周围进行调查,发现麻瓦遗址“位于盐城县东北角……当地还有沙井头、彭家岗、东门头等名称,面积南北约1.5

公里,东西近1公里,范公堤在遗址东部穿过,中心部分原高出地表3米。”^[19]该文参照出土文物,认为麻瓦遗址有周代和汉代两种文化堆积。此后,麻瓦遗址陆续发掘出古瓦井九口,砖井四口。沙井前的一处屋基中,出土了炼渣、红烧土、铁沙、铁刀、铁犁、铁铤和破残的铁锅、铜鼎、铜箭镞、陶范等生产用器物。在沙井东屋基多间,发掘出已锯过的鹿角料等物,似为骨器制造工场。沙井之西一处屋基,发掘出不同花纹的瓦当,下水道中还发现封泥多枚,其中一枚有“射阳丞印”四字,一枚为战国文“祝其亭玺”四字。

此外,从出土货币来看,1982年8月,位于市区人民中路(原范公堤)西侧的市委党校路西120米处,从地下80厘米处,出土了陶罐窖藏的“半两”铜钱。1985年5月,市中医院东大门外路边北20米处,从地下60厘米处,出土两陶罐窖藏的“半两”铜钱,重1.5公斤。经现场调查了解,上述出土的三罐窖藏“半两”古钱容器均为泥质绳纹灰色陶罐,已残破,是西汉早期遗物。在宽1.5米,长40米的狭小范围内,还发现有泥质绳纹有眼陶片圈套迭而成的水井九口,并出土有陶碗等残陶器、残铁器等其他秦汉时期的遗物。1985年7月,在人民中路路西115米处从地下1米处出土了一枚传形“半两”铜钱。“半”字在左,“两”字在右,重3.2克,直径2.8厘米,为“战国秦半两”。伴随出土的还有陶碗、陶罐和大批战国至西汉早期的席纹、方格纹、网纹、绳纹陶片。^[20]上述三处出土的半两钱,出土地点皆在麻瓦遗址的东北部;而麻瓦遗址出土的半两钱年代横跨战国至汉代,可见西汉时期的麻瓦遗址已拥有丰富且具有持续性的经济活动。

2022年7月至2023年7月,盐城考古工作者对沙井头进行发掘,揭露出规整的汉代道路,较为密集分布的水井,成规模、多类型的排水设施以及房址,大量瓦当和绳纹瓦片等遗迹遗物,同时也在遗址东北角发现贝壳沙堤堆积。丰富的遗存都说明汉代时期沙井头已是一处具有官署性质的处所。

自20世纪50年代起在麻瓦遗址发现的遗存,到近年在沙井头遗址考古工作中发现的文物,皆能充分说明该区域自战国起至汉初逐渐繁华。尤其是“祝其亭玺”印泥的发现,说明此处处在战国时期就已承担政府行政职能,结合汉代大量建筑遗址的发现更说明该处处于行政职能的中心。

4. 麻瓦遗址周边的汉代墓葬及水井

(1)墓葬。麻瓦遗址东南至伍佑镇之间,分布着许多大小不等的土墩,俗称头墩、二墩、三羊墩、三墩。头墩位于东闸加油站东面(东闸新村),在麻瓦遗址东南2公里,头墩至二墩3公里,二墩至三羊墩南2公里、三羊墩至三墩2公里,都位于范公堤一线。袁颖和黎忠义认为在麻瓦坟至三羊墩10公里之间有一些大小不等的土丘,有一些土丘的地表曾发现过汉代遗物,推测是汉人的葬地。这些葬地应该是与遗址相互关联的。^[21]

1963年,三羊墩发现2座土坑木椁汉墓。其中1号墓规模较大,三棺两厢,用珍贵的楠木板七十余块排列构筑成椁室。棺用整段楠木掏挖雕琢而成,棺下铺垫厚约六厘米的汉五铢钱一层。1号墓出土器物计91余件,以漆器为主,漆器上有“上林”“大官”字样,墓主人或为西汉晚期或东汉初期的盐铁官或大盐商。2号墓出土器物33件,以陶器为主,为一般官吏或地主。1号墓2号墓都属于西汉末东汉早期,2号墓稍早。

1975年,根据原市博物馆考古部主任、副研究馆员王爱东陈述:头墩位于城东南不足2公里,在范公堤东侧,原来墩高约8米,后来因取土逐渐削平。墓坑为长方形竖穴,木椁均为整块楠木组成。墓主为男性,出土的漆耳杯底部书有“徐”字,推测应为墓主人的姓氏,墓主人身份应为一般官吏或地主,其年代应为东汉早期。

2018年,盐城二墩汉墓群共发现20座汉墓,规模较大的8座。其中保存最为完好的M51,棺内有成年男性尸骨一具,随身陪葬的有一些腐朽的编织衣物,还出土铜质带钩一件和银质穿带小方印一枚,方印款识为“周视”,侧厢内也出土了一枚“周视”款木印,或为墓主姓名。脚厢和侧厢放置墓主人的随葬品,主墓室放置墓主人的大漆棺木一具。棺木用绳索捆系,盖板上放置铍、便面,估计应为汉代的下葬风俗。出土文物上印有“中官”二字,意思是宫内、朝内之官。考古项目负责人杭涛研究认为,M51墓主人应为西汉至武帝时期的盐官。

2021年,盐城中国海盐博物馆(盐城市博物馆)、镇江博物馆联合对瓢城记忆项目墓地(位于麻瓦遗址的西1公里),进行抢救性发掘,发现61座古墓葬,其中5座汉代墓葬为土墩墓,在平地先堆土成墩,然后在墩上埋葬墓葬,出土器物较少,墓葬形制皆为平民墓。

2022年,盐城中国海盐博物馆(盐城市博物馆)、镇江博物馆联合对东闸新村墓地(头墩)进行抢救性发掘,共清理西汉至明清时期墓葬270座,其中汉墓14座。其中M82保存最为完整,等级最高,竖穴土坑木椁墓,皆为楠木材质。椁盖之下的天花板,以黑漆为地,彩绘勾连云鸟纹饰。M82共出土文物121件(套),包括一件造型精美的青玉谷纹璧,足厢内还发现大量以竹筥盛装的陶郢爰与植物种子。M84位于M82西北部,规格相对较小,同为竖穴土坑木椁墓。棺椁以杉木为材。共出土文物32件(套),另有釉陶甗与铜镜各一件。在边厢东端整齐摆放着两套陶郢爰与一堆泥质半两钱,已严重朽坏。根据墓葬形制与随葬器物,可知两座墓葬年代相近,时代约在西汉早期(公元前190—前180年),基本沿用了楚墓的葬俗。^[22]

(2)水井。1994年,盐城市文管会、盐城市博物馆在建军路市政府(麻瓦遗址南500米)2000平方米面积上,发现水井23口,东汉时仅1口、西晋至南北朝3口、隋唐5口、宋元6口、明1口,其他不可知12口。^[23]

2021年,徐州博物馆、盐城市博物馆对原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地块汉唐墓地考古发掘(黄海路南,沿河路东,麻瓦遗址西部边缘),清理水井12口,其中汉井10口,宋井2口。

2021年,徐州博物馆、盐城市博物馆对八十间(迎宾路西、毓龙路南,紧邻麻瓦遗址南端)抢救性发掘水井共17口,其中清代6口,元代5口,宋代4口,汉代2口。

通过对头墩、二墩等麻瓦遗址周边汉代墓葬

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距麻瓦遗址越远,墓葬数量也就逐步减少。较高等级的墓葬基本分布在东沙冈上(古范公堤)一线。西部洼地应为平民墓葬,数量较少。通过考古发现的汉井大致可以划出麻瓦遗址的范围应该是东至人民路(古东沙冈),南至中茵海华(老市政府)向南延伸500米至串场河,西至沿河路(串场河),北至人民公园(北新洋港)。遗址中心偏西部和北部,而沙井头遗址应该位于麻瓦遗址的中心。

关于盐渑县城的城墙位置尚无定论,截至目前的考古工作中,麻瓦遗址尚未发现城墙遗迹,这也成为部分学者否认麻瓦遗址为盐渑县治所在的力证。根据《哈佛中国史·秦汉》陆威仪在讨论秦汉时代的历史意义时指出:在这个帝国控制下,中国,也就是帝国的核心区域,由于制度、文化、社会的整合,不仅在内部“去军事化”,而且在政治—文化—生活上逐渐“同质化”。这也说明,汉代新建县城的城墙并不是必需品。本文认为该处设县的主要原因为经济地位的逐步上升,再加上其独特的地理环境,无需进行围墙防止入侵。

四、结语

根据历史文献资料梳理及考古资料佐证,可以推测出盐渑置县的准确时间,分析出盐渑置县是因为其独特的经济地位、地理位置。盐渑置县是汉代初期封国巩固统治,中期“除国置县”巩固中央权力,“开三边”加深边疆治理的连续性政策背景下产生的结果,也是汉代对东南开发的必备节点。而盐渑县治应该在今沙井头遗址一带,这也是春秋以来先民对江淮一带向东开发的结果。

参考文献:

- [1] 姜立邦. 盐城地名琐谈[J]. 盐城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1):81-85.
- [2] 凌申. 盐业与盐城的历史变迁[J]. 盐业史研究,1997(2):39-42.
- [3] 周运中. 盐城在海中考[J]. 盐业史研究,2007(2):41-45.
- [4] 南京博物院. 江苏射阳湖周围考古调查[J]. 考古,1964(1):26-29,18.
- [5] 吴桂兵. 三羊墩汉墓与两汉盐渑区位分析(纲要)[C]//盐城市海盐文化研究会,盐城师院社会学院,江苏沿海开发研究中心,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江苏省商业经济研究所《江苏商论》编辑部. 汉唐社会经济与海盐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教研室,2008.
- [6] 陈昌文. 汉代城市的布局及其发展趋势[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1):56,58-61.
- [7] [汉]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 [8] [南朝宋]范晔. 后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 [9] 盐城市郊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盐城县志[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
- [10] [清]龙继栋. 光绪盐城县志[M]. 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59册).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 [11] 陆玉芹. 盐城文化的历史考察[J]. 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 40(6): 1-8.
- [12] 王红花. 江苏盐城市出土战国封泥[J]. 考古, 2005(9): 68.
- [13] 周振鹤. 西汉政区地理[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5.
- [14] 马孟龙. 西汉侯国地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 [15] 马孟龙. 西汉侯国地理[D]. 上海: 复旦大学, 2011.
- [16] 但昌武. “七国之乱”后吴、淮南二地政区的调整[J]. 历史地理研究, 2022, 42(2): 40-49, 156.
- [17] [汉]司马迁.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卷118[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 [18] [清]刘荣照修; [清]陈玉树, 龙继栋纂. 光绪盐城县志[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 6.
- [19] 黎忠义, 尤振尧. 江苏射阳湖周围考古调查[J]. 考古, 1964(1): 26-29, 18.
- [20] 熊涵东. 江苏盐城出土的半两钱[J]. 考古, 1989(8): 756-759.
- [21] 袁颖, 黎忠义. 江苏盐城三羊墩汉墓清理报告[J]. 考古, 1964(8): 393-402, 7-9.
- [22] 赵永正, 史为征, 苏楠. 江苏盐城东闸新村墓地[J]. 大众考古, 2022(7): 12-15, 98.
- [23] 俞洪顺. 江苏盐城市建军中路东汉至明代水井的清理[J]. 考古, 2001(11): 29-41, 98-99.

Research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Yandu County in the Han Dynasty and Analysis of Its Location

SHI Weizheng, LIU Xueyan, SUN Mengmei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and Archaeology, Yancheng Jiangsu 224001, China)

Abstract: Research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Yandu County during the Han Dynasty is abundant, and previous studies have largely confirmed that Han Yandu County was founded on the East Shagang of present-day Yancheng. Previously, research on the timing of Yandu County's establishment has primarily relied on the examination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supported by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to analyze the county's establishment in the context of its unique economic status and geographical location. This paper intends to analyze the latest archaeological data from Yancheng, combined with a review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to ascertain the purpose of establishing Yandu County and thereby determine the timing of the county's establishment and location of its administrative seat during the Han Dynasty. This paper preliminarily concludes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Yancheng County was a result of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consolidating rule in the early Han Dynasty, "replacing kingdoms with counties" to strengthen central power in the middle period, and "opening up the three borders" to deepen frontier governance. It represents a significant mileston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utheast coast during the Han Dynasty, reflecting the evolving policies of the Han Dynasty in response to changing times. Furthermore, the location of the administrative seat of Han Yandu County should be at the Mawa Site, which is now the area around the Shajingtou Site.

Keywords: Yancheng; Yandu; Han dynasty; county establishment; county administration; location analysis

(责任编辑: 沈建新)